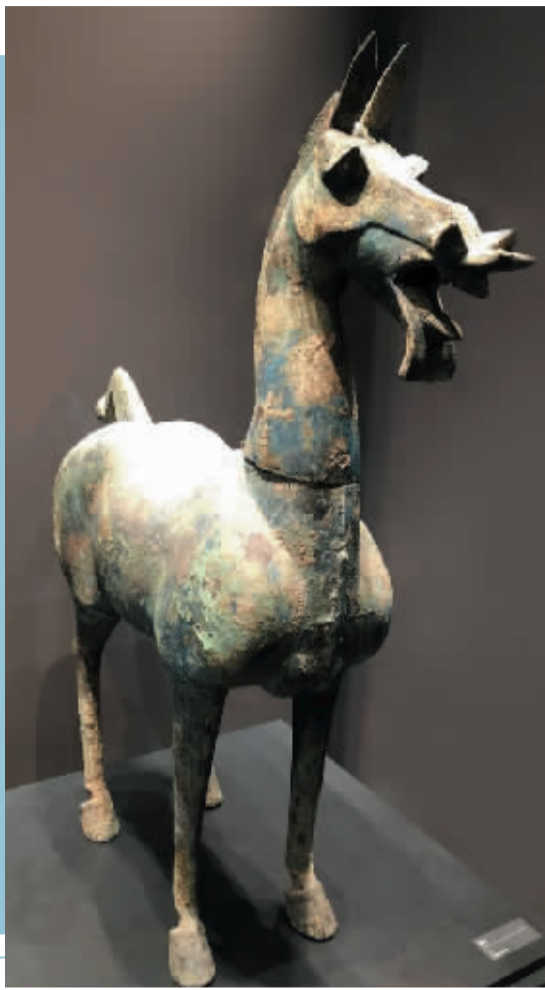


东汉铜马见证了一个被“马文化”烙印的时代



■保定博物馆藏东汉铜马(一号)。



东汉铜马,1981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(今保定市徐水区)防陵汉墓二号墓,为目前河北省内发现体型最大的青铜马,分为直颈和曲颈两尊。直颈铜马,通高1.16米,身长70厘米,重量约51千克;曲颈铜马,通高1.13米,身长66厘米,重量约51千克。

两件铜马体型硕大,形象逼真,通体造型丰满骏逸,各部位比例准确,富有动感,代表着汉代的铸造工艺水准,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。现藏河北保定博物馆,为该馆镇馆之宝。



■保定博物馆藏东汉铜马(二号)。

□文/图 砾华

一静一动 相映成趣

1981年,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防陵汉墓群的一次考古发掘,让两尊沉睡了近两千年的铜马重见天日。它们以其惊人的体量和写实的风格,在出土之初便震撼了考古学界。其中,通高1.16米,前胸宽24厘米,身长70厘米的“一号铜马”,四肢修长体态矫健。它昂首竖耳,张嘴露齿,正直视前方;通高1.13米,前胸宽41厘米,身长66厘米的“二号铜马”,躯干更为粗实雄壮,前胸格外宽厚,更加凸显了力量感。它扭头竖耳,作嘶鸣状。两件铜马头小英俊、颈长弯曲、腰围宽厚、四肢修长的特征,与汉武帝孜孜以求的西域“天马”(即汗血宝马)形象相符。它们一静一动,相映成趣,富有戏剧化的表情张力,正是汉代艺术家捕捉生命瞬间、追求神韵超越形似的高明之处。

支撑起雄骏姿态的,是东汉时期已臻化境的青铜铸造技术。与著名的甘肃武威铜奔马(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,旧称“马踏飞燕”)采用“陶范铸造铸接法”类似,出土于保定徐水防陵汉墓的这对铜马,同样采用了分铸套接的复杂工艺。其头、耳、身、腿均为分别铸造,然后通过精巧的榫卯结构套接而成。这种工艺不仅降低了整体铸造的难度和风险,更便于对马匹不同部位进行细部刻画和姿态调整。另外,通过甘肃武威铜奔马的科学检测,专家揭示了一项关键技术:工匠在马腿内预先夹入铁芯骨,再浇注铜液,由此形成“铁骨铜腿”。这项工艺极大增强了马匹关键承重部位的强度,确保器物历经两千年而不坍塌。虽然,保定徐水的这两件铜马尚无同样的检测报告,但作为同时期、同等级的大型青铜马匹,极有可能也应用了相同或类似的技术。

汉代人铸造铜马时这种不惜工本、追求极致的做法,堪称汉代整个社会对于“马政”高度重视的缩影。

一个被“马文化”深刻烙印的时代

在冷兵器时代,马匹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关乎国运兴衰,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。可以说,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被“马文化”深刻烙印的朝代。

汉代以前,中原本土马的体型不同于后来,较为低矮。马的基因发生改变,得益于汉武帝自西域引入汗血宝马的举措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,乌孙王遣使给汉武帝献上良马数十匹,汉武帝将之命名为“天马”。同时,张骞也带来了西域大宛国(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)盛产良马的信息:大宛“多善马,马汗血,其先天马子也”。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和太初三年(公元前102年),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两次出兵大宛国。汉军击破大宛贰师城后,得到大宛善马数十匹,中马以下雌雄马三千余匹进献汉武帝。这场持续四年、耗资无数的战争,虽被后世史家诟病,但其政治与军事意义却十分深远:它极大震慑了西域诸国,奠定了汉朝在西域的霸权,同时,大宛“天马”的引入,带来马种的改良,使之由中原本土的粗短矮小马变为高头大马,对于汉王朝军力的增强有重要意义。据《汉书·礼乐志》记载,汉武帝得到大宛马后,曾经两作《天马歌》。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,武帝得到一匹生长在“溼洼水中”的天马,喜不自禁,随作歌曰:“太乙况,天马下,沾赤汗,沫流赭。志倜傥,精权奇,策浮云,暗上驰。体容与,驰万里,今安匹,龙

为友。”这首《天马歌》,将天马提升到与龙为友的神兽地位。之后,当汉武帝又从大宛国获得一匹原种“汗血马”时,喜不自禁又作《天马歌》:“天马徕,从西极,涉流沙,九夷服。天马徕,出泉水,虎脊两,化若鬼。天马徕,历无草,径千里,循东道。天马徕,执徐时,将摇举,谁与期?天马徕,开远门,竦身身,逝昆仑。天马徕,龙之媒,游阖闾,观玉台。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。”

说到代人与马,帝国战神霍去病与战马的故事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霍去病18岁率八百骁骑深入大漠,六日转战千里,其疾如风的闪电战法,全赖精锐骑兵与良马。他生前爱马,死后其墓冢被修成祁连山形状,以表彰他在河西走廊、祁连山一带立下的赫赫战功。陈列于墓前的“马踏匈奴”石雕,成为其战功的最高象征。那匹昂首屹立的战马,脚下踩着仰面挣扎的匈奴武士。虽然没有细腻的雕工,却以浑厚造型与磅礴气势,诠释了“大汉天威”与“铁骑精神”。这不仅是纪功碑,更是汉代将马与国家武功、英雄主义直接挂钩的视觉宣言。保定铜马虽无此戏剧化场景,但其昂首挺胸、肌肉饱满、蓄势待发的姿态,同样共享着这份来自汉代的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。

到了东汉时期,马的重要性已从国家战略,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成为身份、财富与观念的立体坐标,成为严格等级制度的标识。据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,东汉有“贾人不得乘车马”的规定。商人即便富可敌国,也无权乘马车出行,这是士农工商社会秩序的铁律。车马的规制(如马车是否有篷盖“辒”、车轮的辐条数量)直接对应官秩高低。由此亦可见,保定徐水防陵汉墓能随葬如此巨型精美的铜马,其墓主人必然是高级官吏或地方豪强,这对青铜马应是其生前显赫地位在冥界的延续。

写实与写意的高度统一

在艺术长河中,造型独树一帜的汉代骏马,与先秦时期装饰化、符号化的马形象不同,也与唐代三彩马丰满圆润、色彩绚丽的华贵风格相异,达到了写实与写意的高度统一,彰显了“力量”与“动势”。保定徐水防陵汉墓出土的东汉铜马,正是有关于此的实物例证,它们严格遵循解剖比例,骨骼、肌肉的起伏转折被精准把握,尤其是肩胛、胸肌和后腿的隆起,充满迸发的力量感。然而,这种写实并非西方古典主义的冷静客观,而是浸透着汉代特有的古拙与浪漫。工匠用高度概括的线条勾勒出马匹的轮廓,省略了不必要的细节,将全部精力集中于表现马的精神——一号铜马目视远方的那种坚定与肃穆,二号铜马扭颈嘶鸣时的那种瞬间爆发感,都超越了单纯的形似,直抵气韵生动之境。

回溯过往,这对“河北省内发现体型最大的青铜马”,不仅是保定深厚历史底蕴的物证,更是汉武帝为梦中之马发出的远征号令,是霍去病墓前石马所象征的帝国武功,是丝绸路上驼铃与马蹄声交织的文明回响。它们,以青铜之躯,凝结了汉代的强健、开放、浪漫与想象,仿佛汉王朝历史叙事中一个沉静而有力的注脚,向我们诉说着那个“天马行空”的伟大时代。

作者简介

砾华,本名李立华,河北博物院副研究馆员,长期从事文博宣传工作,多年致力于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。著有散文随笔集《闲心闲悟》、文物诗画《梦幻的艺术》等。

本版邮箱:yzwbwszh@163.com